

水浒戏曲：水浒故事的“基本演绎法”

□张淑婧

水浒故事早在南宋时期便已流行于民间，后历经世代累积，终于在元末明初形成了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而在小说诞生前后，水浒故事的民间流传载体主要是水浒戏曲。水浒戏曲，顾名思义就是以水浒人物故事为题材创作的戏曲作品。由孙琳先生辑校的《水浒戏曲集成》将现存的所有有关水浒人物、事迹的戏曲作品悉数搜集并加以整理，共计140余种（其中体量最大的《忠义璇图》分10本240出），其数量之多自不待言。且相比小说，水浒题材戏曲不但更早出现，而且因其须由表演呈现的体裁特征在民间的传播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因此，提到水浒故事，虽然我们首先想到的一般都是小说《水浒传》，但其实丰富多彩的水浒戏曲才是水浒故事的“基本演绎法”。

《水浒戏曲集成》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由凤凰出版社于2022年12月正式出版，孙琳先生此次对水浒戏曲的整理工作，有着多个层面的意义。首先体现在“水浒”研究领域，其对水浒戏曲及其多种版本的搜罗之全，无疑具备着极大的文献学价值。水浒戏曲文献，从古代或在民间传抄或不成体系地散见于《录鬼簿》《续录鬼簿》《太和正音谱》《曲品》等文献中，到20世纪中后期由傅惜华先生《水滸戏曲集》、王德信先生《水滸戏曲考论》等进行初具系统的整理，再到如今孙琳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对《全元戏曲》《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等新编戏曲集的筛选及藏于各大图书馆的罕见稿抄本的搜集，最终完成了现阶段对水浒戏曲最为全面的辑录与整理，斯功甚伟。尤其是对于各种稿抄本及《忠义璇图》两种残本的辑录，更显此书的版本学价值。此外，《水浒戏曲集成》的编写还为水浒故事的传播与流变研究、不同时代的水浒故事书写研究、水浒故事的跨文本研究等多种研究方向提供了全面而珍贵的参考资料。

其次，对于水浒故事爱好者而言，《水浒戏曲集成》可被视为一部古代水浒同人创作合集。众多戏曲对小说《水浒传》人物及剧情的别样演绎，分别从不同方面满足着读者的想象。《水浒传》的结局之所以有着如此动人心魄的力量，主要源于其出色的人物塑造。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称“《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正因如此，当我们看到这些“可爱的

草莽英雄”所经历的非死即伤、悲欢离合，才会感到唏嘘不已、扼腕而叹。虽然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已然十分到位，但读者对于自己所喜爱人物的遐想是无穷的，在这一点上，主要围绕一个人物的某个事件进行延伸演绎的多种水浒戏曲自然也就满足了水浒爱好者对于想要看到自己喜爱人物更多动态的需求。而《水浒传》对于非主要人物的塑造同样精彩，因此也衍生出众多关于非主要人物与支线情节的创作，例如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金瓶梅》，以非主要人物西门庆为主人公，演绎了一出活色生香的市井人情悲喜剧。事实上此种类型的衍生创作还有很多，同样大多数还是以戏曲的形式呈现，如《花田错总讲》一剧将小说中鲁智深救刘太公女一事延展开来，演绎了一部趣味纷呈的才子佳人式喜剧，本是小说主要人物的鲁智深等人在这出戏中反而成了配角，亦为读者提供了不同以往的新奇视角。还有部分戏曲将对结局抱不同态度读者的想法以再创作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满足人们的想象。对于《水浒传》中“招安”结局的认识历来是极富争议的，对于“招安”一事唾弃之人亦不在少数，那么以《偷甲记》为代表的系列“反水浒”倾向的戏曲作品则可谓正中其下怀。

《水浒戏曲集成》对于水浒戏曲的搜集与整理，除对“水浒”领域内的贡献外，无疑还具备着其他显著且多方面的现实意义，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传统文化的普及层面看，《水浒戏曲集成》囊括了多种不同的传统戏曲形式，有助于增进大众读者对于传统戏曲的了解。这些形式有杂剧、传奇，包括昆腔、高腔、乱弹、皮黄、梆子腔等多种演绎方式在内的清代戏剧以及快书、子弟书、牌子曲等讲唱文学。一些经典的故事情节诸如“逼上梁山”“景阳冈打虎”“坐楼杀惜”“大闹翠屏山”等往往被演绎为多种形式，读者可通过对于相同情节不同演绎形式的对比阅读了解不同戏曲形式的特征。

其次，从语言学研究层面看，《水浒戏曲集成》中收录的众多戏曲作品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字、白话、方言等的重要参考资料。《水浒戏曲集成》主要收录了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戏曲作品，可用于对不同时期的白话及其演变之研究；众多清代戏曲抄本的用字情况极为复杂，各种类型的异体字层出不穷，对此整理者专列异体字对照表，置于书末，可为俗文学的用字研究所参考；还有大量戏曲作品如《山门》《戏叔全串贯》等的人物对白部分皆以方言



书写，亦可用于明清方言的研究。这些戏曲底本原散落各处，极难查找，如今全部汇集一处，对于相关语言学研究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便利。

最后，从语文教育的层面看，《水浒戏曲集成》是一部辅助教学、丰富课堂形式的素材库。小说《水浒传》是初中阶段必读名著，《景阳冈》《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分别为人教版小学、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课文。而《水浒戏曲集成》中与这两篇课文相关的情节均有多种形式的戏曲变体，既可以直接用于戏曲排演或作为延伸阅读材料，以丰富教学、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又可以作为剧本写作与剧本改编的教学案例，在阅读与实践帮助学生更加形象地理解小说与戏曲不同的体裁特征及在写作时应侧重的方向。

“听伊分诉怒气欲冲天，由不得心头烈焰燃，吾当勇往直前，看俄然锄破强梁安良善。”（《忠义璇图》残第四本）水浒故事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被一代又一代的爱好者推崇至今，作为其载体之一的水浒戏曲更是具备着审美与实用的双重价值，理应在今天被充分发挥，因此才有了孙琳先生数年如一日对于《水浒戏曲集成》的整理点校工作。如今这份付出终于化为成果，得以供各行各业、着眼不同领域的读者各取所需，其未来还将创造出怎样的价值，属实令人期待。

春天是读诗的季节。物候回暖，万灵复苏，陈旧的枝干上萌发新绿，引人情动，阅读《趣说人间好诗词》（后文简称《趣说》）的过程便是这样一趟春日之旅：看旧景中孕育出新美，从古典诗词中汲取新生的力量。

这是一本思考有新意、表达有温度的古典诗词鉴赏文集。作者史双元在书中撷英拾萃，择精妙高绝之篇，用幽默风趣之笔，讲述诗里词外的动人故事。全书谈诗论词如春雷乍响，点破“一字千金”的名篇中“惊心动魄”之情；又如东风拂过，用新锐的解读视角助使古典诗词的枝头抽出新生之芽；亦似春雨绵绵，笔下文字情重，美的文辞与美的情感共同滋养读者心灵，“润物细无声”。

用共情勾连起古典与现实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感是支撑起中国古典诗词之树长存的主干。《趣说》开篇便定下写作的基本原则——“言之有情，贴近古人，同情共鸣，以有温度的表达转述古人心思。”

情感是古今共通的，但动情的契机往往随着时代的转变而有所不同。对解诗者来说，解诗近似于“翻译”，把古之生活、观念翻译成今之现实，使读者闻之亲切，其中自然也包含“翻译”这种已发生转变的契机。《趣说》显然注意到了这种“翻译”对读者是否能产生共情的作用，书中随处可见巧妙的“翻译”。孟郊写《游子吟》以歌母爱，诗中远游在即带来的骨肉分离之情和慈母灯下补衣的辛酸场景是古人共鸣度极高的元素，放在交通发达、信息便捷的现代社会却难免稍显褪色。《趣说》高明地避开赘述诗中正面描写的远游与补衣，而是从孟郊本人的生平经历入手，详写孟郊屡试不第的落榜生涯。高考落榜的苦闷、邻里乡亲怀疑的目光，都是今人也感同身受处境。如今见到补衣的机会少了，《趣说》描绘的那副翎羽回家，只有母亲不问成败、安慰落榜子女的场景却更为普遍。由此，诗中母亲的“心意”才更能令人读之动容，莫不垂泪。

在碰到另一些以意境见长的诗歌时，这种技巧性的“翻译”便不如更直接的文字渲染了。刘颢道：“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披文”不精，则“入情”不深。《趣说》便采用最直接的文本细读法，用诗人的第一视角将诗词化作一篇美文，用诗意的语言阐释诗意的感情，也即书中自言“言之有文，以美的文辞译美的诗词”。读刘邦《大风歌》，恐常人难近帝王之心，书中从刘邦回乡写起，截取刘邦大宴乡亲的历史场景，细致入微地刻画刘邦在高台之上的所思所感。帝王之情，一句一顿一转，起伏之间，层层渲染，帝王搅动风云的壮志豪情尽在其中。“此时此刻，风起云涌，山河辽阔；日月星辰，群臣拱卫；天下之大，我居其中；驾驭海内，舍我其谁！”读之如同身临其境，似乎目睹刘邦击筑高歌之景，气之所感，情之所动。

《趣说》并不死板，在勾连古典与现实的过程中，它因篇而异，灵活地采取“现场还原”“古今对谈”“穿越式阅读”等带有创新意义的赏析模式。这些模式在书中被作为一套成体系的理论提出，又在之后的赏析实践中大获成功。《春江花月夜》的安宁怅惘、《琵琶行》的失意愁怨、《江雪》的孤绝岑寂……在重寻古典诗词之美的道路上，共情使读者透过千年不变的文字，触及诗人依旧鲜活温暖的灵魂。正如钟振振评道：“情共古今，原来你与一首诗、一阙词的距离如此之近。”

看旧景中孕育出新美

作者史双元无疑是勇敢的，他不避经典，所解诗词不乏诗评早已盈篇满纸的名作，但书中观点仍颇见新意。这就使阅读本书的过程如赏春日佳景，当看到旧日老枝上长出新芽，心中涌动的不仅是惊喜，更有感动。

嫦娥能被塑造成多少种形象呢？千百年来，嫦娥与万千宫女贵妇共用同一张面孔，永远忧愁、悔恨，郁郁不乐，正如李商隐笔下的嫦娥，“碧海青天夜夜心”。《趣说》把嫦娥从压抑被动的处境中释放了出来，用勇敢、反叛、孤傲武装这位女神，称赞她为“中国的娜拉”，肯定并歌颂她那石破天惊的出走。神话是虚无缥缈的，既然人人都能为嫦娥涂抹上色彩，她为什么不能是代表力量量的女神，为什么不能是所有遭遇不幸的妇女之榜样呢？从这一刻起，嫦娥形象的内涵再次变得丰满鲜活，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国古典诗词的内涵是丰富的，但这种丰富并非一成不变，若没有女性主义新思潮的东风来唤醒，嫦娥依旧沉睡在旧时代的深闺里。唯有解诗者主动用新思潮重新审视古典诗词，发现适于新时代的精神价值，才能使诗人、诗中事经受一代代读者的考验，成为一代代人的精神养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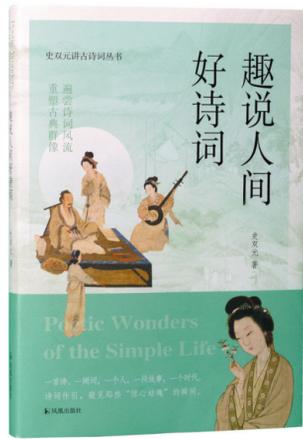
老树抽出新芽，离不开成长过程的蛰伏蓄力。古典诗词中的新美，本质上植根于深沉广阔、积淀厚重的中国文化土壤。嫦娥之所以可以是反叛的，在于奔月神话的基本框架便是挣脱束缚、追求自由，这则神话本身便是我们弱小却勇敢的祖先在对抗大自然时发出的呐喊。发现新美，必对中国文化有着极为精深研究。研究愈深，古典诗词之美愈加动人。乍读《元日》，可感诗中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的欢乐美好氛围。若了解诗人生平、历史背景，也能读出王安石借春节新旧交替的气象抒写对革新政治的坚定信念和热切期盼。《趣说》则更进一步，以《元日》为切入点，窥见中国文化的再生能力和中华民族相信逢凶化吉、绝处逢生的积极乐观情感。在术数流行的时代，祖先们将民族困难时刻的记忆归纳整理而系之于双重奇数的日子下面。尔后，祖先们并未选择恐惧、躲避这些“重单”日，而是燃放爆竹、划起龙舟、登高采菊，用喜庆、热闹的活动冲淡这些日子不祥意味，把痛苦转化为祥和，把恐惧转化为向往。这种奇妙的民众心理，便是独属于中国人的“超能力”，《元日》因此而增添一份坚韧之美。

诗词鉴赏是需要从旧景中发现新美的工作，但绝非为出奇而出奇。《嫦娥》的反叛与时代精神吻合，《元日》的坚韧被当下的我们所需要，从古典诗词中，我们汲取到了真正有用的精神力量，这才是今人再读古诗的缘由。叶嘉莹谈解诗道：“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就是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读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史双元《趣说人间好诗词》的解诗正是这样的一种“再生的活动”。

从古典诗词中汲取新生的力量

——读《趣说人间好诗词》

□行者



新书推荐·凤凰出版社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

刘跃进 著
2023年2月



中古文学即魏晋南北朝文学，作者刘跃进以原始文献为中心，以朴学精神为指引，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文献作了全面梳理和述评。对于学习中古文学的新手来说，这部书可以零基础入门；对于有志在中古文学领域作一番探索的研究者来说，这部书可以作为出发点；至于其他领域的读者，遇到与中古文学相关的话题，这部书可以用来检索。

《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全3册)

[唐]杜甫撰；
旧题[宋]王十朋集注；
曾祥波点校
2022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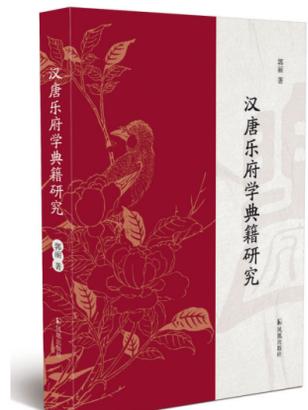
作为编年集杜诗注本，本书博采众说，保存了大量的宋代名家注文，是现存杜集宋注本中仅有的“百家注”本，也是杜诗“千家注”的源头性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价值。本次整理，以存世孤本玉海堂藏本为底本，以他校法对明显讹误处作“校记”，并对年号、地名、人名、书名等加以专名号识别，以便阅读。

《中国淮扬菜志》(全5册)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2022年12月



这是一部淮扬美食文化百科全书。编历时5年，收录图片434张，共5卷，从沿革、名菜、名点、宴酒店、拾遗等方面全面系统记述了淮扬菜的起源与萌芽、兴起与形成、鼎盛与高峰、传播与发展；展示了404道风味名菜、323道风味小吃、148套风味名宴、388位古今名厨、365家名企名店等，充分反映淮扬菜的发展历史、菜系特点和美食文化。



一幅汉唐乐府学典籍地图

——读《汉唐乐府学典籍研究》

□王晨韵

提起乐府诗，大家并不陌生，立刻能想到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篇章，我们会想起《江南》中自在嬉戏的小鱼，想起《木兰辞》中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想起《孔雀东南飞》里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凄美爱情，想起《上邪》中义无反顾的忠贞誓言。然而，关于“乐府”，实际上我们又知之甚少。

何为“乐府”？“乐府”本为秦汉间朝廷设立的掌管音乐的机构，最初起源于秦朝，1976年出土的秦代青铜器乐府钟可作证明，汉武帝时沿用其名称设立“乐府”，扩大了规模，主要职能为采集、整理、创作及表演音乐。用来配乐演唱的歌词也被称之为“乐府”。后来“乐府”渐渐脱离音乐，成为诗歌的类名，即“乐府诗”。

何为“乐府学”？“乐府学”即以“乐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乐府学典籍”是汉唐间围绕乐府活动产生的历史文献，是乐府学研究的基础，大致可分为正史乐志（包括政书乐门）、乐书、乐录、歌录、琴书、解曲、曲簿、注释、诗学等类别。

《汉唐乐府学典籍研究》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唐乐府学典籍研究”的结项成果，属于文献研究类著作。书中对汉唐间有关乐府的文献进行系统考察，厘清文献留存情况，分析各类典籍所含具体内容，梳理各类典籍间的承袭关系，判断其文献价值，确立其历史坐标，并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本书极富问题意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延展多种研究思路，指出治学门径，对汉唐乐府的研究具有目录指引作用。

作者郭丽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乐府学会理事，跟随吴相洲教授从事乐府学研究多年，学力深厚，出版有《乐府续集·宋辽金元卷》《乐府文献考论》《乐府诗史》等多部乐府学研究著作。她数十年来在乐府学领域不懈耕耘，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在充分掌握汉唐乐府学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浓缩其文献价值，化繁为简，才成就了《汉唐乐府学典籍研究》一书。通读全书即可通盘掌握汉唐乐府学文献的基本情况，不论是入门研究者，还是资深专家，都可从中大受裨益。

全书分为三部分，行文结构明晰，第一部分为绪论，对典籍的分类与著录进行界定，评述前人研究成果，并介绍研究思路和基本步骤；第二部分为全书的核心，按照时代顺序分门类地对乐志、乐录、歌录、解曲、诗学等五类主要典籍进行研究；第三部分附录则收录了三篇作者关于汉唐乐府的研究论文。

乐志位居乐府学典籍之首。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乐书，此后各朝正史多设立乐志，文献规模较大。乐志作为官方记载，相对完整地记录了一朝乐府活

动，涵盖范围广，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作者梳理出汉唐间乐志10种，分别为：《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晋书·乐志》《宋书·乐志》《南齐书·乐志》《魏书·乐志》《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音乐志》《旧五代史·乐志》。作者独具慧眼，对以上典籍分别进行介绍，指出其在乐府史上独有的文献价值及可研究的问题。譬如，作者指出魏晋南北朝正史中的4本乐志，是研究转型时期乐府活动的首选史料。与《汉书·礼乐志》相比，《晋书·乐志》记录内容更加丰富具体，更注重说明前后沿革情况。而《宋书·乐志》较之《晋书·乐志》则更加详细，最大特色是收录大量刘宋前的乐府歌辞，是《乐府诗集》之前最重要的乐府学典籍。《南齐书》记录乐府活动较为简单，但在记录燕射歌辞时列举了具体名目，比其他乐志更细致。《魏书·乐志》则记录了北魏朝廷关于礼乐建设的讨论，以及永嘉之乱后西晋乐府流传到北朝的过程，这点尤为珍贵。

本书的4至7章是对乐书、歌录、乐府解曲典籍和乐府诗学典籍的研究。乐录为记录乐章表演情况的典籍，如《乐记》《荀氏录》《元嘉正声技录》《大明三年宴乐技录》等。歌录是收录乐府歌辞的典籍，为表演脚本，如《魏袁歌乐辞》7卷、《三调相和歌辞》5卷、《大乐歌辞》8卷等。乐府解曲典籍为解释乐府题名、揭示本事的典籍，如《琴清英》《琴操》《古今注》《乐府古题要解》等。乐府诗学典籍则是专论乐府诗的诗歌学典籍，涉及乐府诗学观念和理论，如《文心雕龙·乐府》《玉台新咏序》《续诗》《乐府杂诗序》等。作者对这4类典籍进行周密的盘点，述评其内容，考察其成书、流传、特点、价值和被研究情况，让读者对文献信息一览无余。

作者还悉心考辨了乐府研究史上的一些难点问题。例如，在《史记·乐书》的作者问题上，她指出《汉书·艺文志》《汉书·司马迁传》《汉书·班彪传》均称《史记》阙漏10篇，《史记·乐书》中还大量引用《礼记·乐记》，加之拼凑痕迹明显、章法不够严谨，且对乐府活动的记载非常简略，因此认为现存《乐书》非司马迁原作，但仍不失为重要的乐府学典籍，具有很高的音乐文献价值。关于为何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燕射歌辞一类中没有收入唐代燕射歌辞这一论题，作者敏锐地发现郭茂倩尽管在燕射歌辞一类并未收录唐代燕射歌辞，但却在燕射歌辞叙论中提及唐代燕射歌辞200余曲，同时，在近代曲辞的叙论中也提到唐代燕射200余曲并且称近代曲为杂曲，在舞曲歌辞的小序中将宴乐舞归为杂舞，元稹《立部伎》题下小注中提及“又选立部伎，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则雅乐可知矣”，这200余曲显然系同一批歌辞，作者由此追索，发现大量唐代燕射歌辞被郭茂倩归入了近代曲辞。郭茂倩之所以这样归类的原因，是因为认为唐代燕射歌辞走向娱乐化，不够雅正，不符合燕射歌辞标准，而更符合郭茂倩对近代曲辞的定义，所以归入近代曲辞。类似于以上这样的思考在书中俯拾即是，显示出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清晰的思辨能力。

承前所述，作者郭丽对乐府学文献了如指掌，使用翔实的史料记载作为全书论述的支撑，将汉唐乐府学典籍的数量、种类、特点、价值、问题、成果等进行系统梳理，并加以提炼总结，向读者一一阐明，绘制出一幅经纬交错、结构清晰、信息量庞大的汉唐乐府学典籍地图，资料价值极高，凭之可以按图索骥。无论是汉唐乐府的专业研究者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可按图索骥，通过参看此书找到自己需要或感兴趣的点。

凤凰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